

# 民國奇人戴傳賢(上)

● 周 谷 (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 現代史上重要人物

戴傳賢季陶先生是民國史上二位極其重要的人物，他是絕頂聰明又富戲劇化的政治才子，是「非常道」的思想聞人。他自民國元年起直接追隨孫中山先生，受其思想薰陶極深，受其知遇最隆。戴在思想上、政治上對民國及國民黨均有其不可磨滅的重大影響和貢獻。戴傳賢中年忽悟佛性，晚年篤信佛理，自燭爛歸於平淡，阿彌陀佛，清靜無為，人稱戴佛爺。現今知道戴佛爺一生的人漸已不多，但他畢竟是現代史上二位旋乾轉坤的重要人物，在歷史上自應有其正確的地位。

抗戰剛一開始，全國各大城市奉令舉辦戰時中等以上學校在校學生寒假軍事訓練。當時我分在成都私立大成中學住校公費訓練三週，除精神訓話、政治課程外，多接受稍息、立正等軍事基本訓練。這所學校不大，提起校名就知道是為崇仰孔門而設的。孔老夫子是集古文化大成的先驅，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聖人。創辦這所學校的是成都五老七賢中的徐炯子休先生，這老夫子學問道德向為川中士林所重。我少小的時

候就常聽祖父提起徐子老、劉豫老(豫波)等人的大名，那天去到徐老手辦的學校份外起敬。那時徐老已經過世，學校為紀念他特修造一座「徐子休先生紀念圖書館」，由「受業戴傳賢敬題」，這時方知道徐老有這樣一位高足，但還不悉戴傳賢何許人也。

## 祖籍吳興家在廣漢

我知道戴傳賢的大名起因於幾件極小的事件。中學時紀念週常在星期一早上舉行，多由訓導主任主持。每次紀念週結束之際，他總獨自先唸完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國民教育守則、青年守則)十二條前言：「總理立承先啓後，救國救民之大志，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宏規，……」然後再領導大家唸完這十二條戒律。當時覺前言文詞典雅，一氣呵成，氣勢雄偉，不知出自那位大家手筆。後來知道是「戴傳賢寫的嘍。」不禁肅然。黨員守則十二條為戴民國二十四年所訂，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國民黨五全大時通過為全黨黨員守則。據說戴寫守則第十二條時，良久苦索不得，一連數夜失眠，一夕擊桌而起說：「有了

。「有恆為成功之本」。戴自謂：「而最後乃貫之以智仁勇三達德，故以有恆為成功之本，為十二條之殿。」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者，悉在於此矣。」有恆為戴傳賢元配夫人鈕有恆之名，因妻名而完成此一著名守則，可謂才思敏切而巧合了。

中學時下課後常與同學到成都少城公園坐茶館或逛書店。有一天漫步少城吉祥街小巷，忽見街上十五號門前懸有兩個紅色大燈籠，各有一個仿宋體大「戴」字，真是威風凜凜，古香古色，有點像前清「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的燈籠。這些燈籠一掛出來，地方官道上自總督巡撫下至九品小吏，都要去遞送手本請安。這原是戴院長在成都的私寓。幾十年來對這兩個「戴」字印象極深。

我班上有一位廣漢同學陳道生，因為他向我講了一則戴傳賢的故事，所以五十年來還記得道生的名字和他的長相神態。他說戴家很窮，戴傳賢發跡後忽然自稱是浙江吳興人，引起廣漢人尤其他舅父的不滿。他的舅父在廣漢城內開茶館為業，忽一年收到他外甥戴傳賢自京寄來的二百元大

洋贈款，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他說他是四川人，足不出四川，也沒有啥子親戚是浙江人，更沒有一個吳與戴傳賢的外甥，不願貿然收下這來歷不明的贈款，堅持把錢原封退回南京去了。陳道生對我說這是廣漢人都知道的故事。是耶？非耶？

初中要畢業時，忽然班上換了一位風度儀態較佳的國文教員，當時約莫四十歲左右。他妙在不教課文，只教新式標點符號如何使用。當時一般風尚要行文流暢，用典確切，文不加點才是上品作文，如今他來教這門新學，當然不受歡迎。學校老師們傳說他是戴傳賢的妹夫潘鑑卿(?)。如果潘老今天要再教這門標點符號課，定願再列門牆當老學生。

戴傳賢於民國十七年十月八日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長，十月十日正式就任，忽於民國十八年起發思古之幽情，題字書法用「吳興戴傳賢」遍示天下，引起四川人的不滿。四川人度量不夠恢宏，不能容忍戴的這種復古運動。民國名人吳鼎昌、胡霖(政之)、任鴻雋他們的祖父或父親，多自浙遊宦入川，或在川經商定居，吳等人都出生在四川，一口成都話。他們很了解四川人，一旦顯貴後自己向來不說是浙江人，所以四川人對他們的印象比較好。

戴傳賢雖自稱浙江吳興人，但他在民國廿四年、廿五年多次提到四川廣漢故鄉老家。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戴為其師徐子休所撰先賢遺訓「備忘錄」所寫前言云「夏間，省墓回蜀。」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給其外甥宋雨生書云「驚悉廣漢慘

遭不虞之禍，感嘆無已。」「值此故鄉大難，無可為助。……」「惟以三十年未歸之游子，此數十年中，對於家鄉無所貢獻，又承諸親友十分厚愛，中心感激，至於涕零。」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致廣漢縣長林葦叢書「驚悉敝邑遭無妄之災」，「去年回廣漢，實已離鄉三十年。」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蔣委員長飛成都督剿中共，戴傳賢院長於五月底至六月初回到廣漢親祭高曾祖及其諸兄之墓，併陪同蔣委員長到廣漢參觀。同年七月戴的「孝園文稿」所列致「蜀中鄉人書」有「傳賢離別祖父坟墓所在地者，三十年於茲矣。」「此次回鄉掃墓」，「昔年總理遺傳賢回川，勸諸領袖，以息內爭與實業者，為救國救民之本。」等文句。抗戰開始，民國二十七年又回鄉掃墓，并擬移居廣漢老家。戴在私人文字上十分眷念老家廣漢，而在書法題字上喜用「吳興戴傳賢」字樣。在京時，常回其高祖老家吳興休居，寓居松雪故園之蓮花莊。

### 死後歸葬四川老家

民國二十四、五年間，南京四川同鄉會對「吳興戴傳賢」深表不滿，決議要開除戴傳賢的四川省籍，并擬向報界公布。這不是故意與戴院長為難開玩笑嗎。戴傳賢不得已幾次派人與同鄉會疏通才不了了之。事實上同鄉會只是一個聯絡鄉誼的機構，那有權力開除鄉人的籍貫。籍貫的認定與廢棄法有明文規定，豈可任由同鄉會代庖。戴傳賢院長當然了解四川人的個性，一聲阿彌陀佛也就煙消雲散了。戴院長是聰明人，抗戰回川

以後，無論題字書法，絕不再用「吳興戴傳賢」字樣。

戴傳賢於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第二次在廣州自殺身死，遺命要葬回四川老家，引起很多四川人的不滿，說他生前不承認是四川人，自認是浙江吳興人，何必死後要葬回四川老家呢，其子家秀仍葬老父於四川成都。那時天下兵荒馬亂，大規模舉行葬禮或追悼會已不可能。一代才子生逢其時，可惜死不得其時。

戴傳賢學名戴良弼，傳賢是派名，字選堂，又字季陶，筆名天仇，在日本筆名散紅生，因信佛法名不空、不動，晚年題字常用孝園，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一)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於四川廣漢城內西街一貧苦人家。

### 自浙入川經營瓷業

戴傳賢的高祖戴敏功浙江吳興人，清乾隆末年隨同鄉做生意，自浙江入川，先在川東，輾轉至今廣漢依同鄉在當地經營江西景德瓷業，起初不過是一個朝奉小職員。以後營業發達，自營「昌泰瓷號」，遂定居廣漢。其曾祖戴崇節繼承遺業，在縣城西街開「昌泰新號」。其祖戴潔軒，其父戴小軒仍從事祖業兼習文事。光緒十六年其祖父曾一度回高祖老家原籍掃墓祭祖。戴的祖父一代與原籍浙江老家尚有往來。

四川地處西陲，地大物博，過去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椒花落時瘴煙起」，所以當年除做官或經商入川外，各路英雄豪傑都憚於蜀道路難，裹足不前。明末清初天下大亂，四川人口銳減

。清廷特下令遷徙四川鄰省兩湖、兩廣人民入川開發實邊。依宗法慣習，長房應在籍守祖宗塋墓，繼承一姓香火，其入川者多非各姓長房。當年「戶有三丁點一丁」驅將西南萬里行，有如囚徒，似如流徙放逐，真是「村南村北哭聲哀」，「哭聲直上干雲霄」。那時移民四川，等於生離死別，誰願意離離祖墳墳墓，父母之邦，遠入蠻荒，身入絕域呢。

，各姓移民入川時多抄有老家家譜祖宗世系，其未攜家譜者，遂乘回鄉掃墓時抄錄本家譜系返川。可惜，中共搞文化大革命時，這些古老文化遺物，多當四書橫掃了。初期移民因語言、習俗、生活與當地土著有差異，又分別自建兩湖會館、兩廣會館、陝西會館、江西會館、浙江會館、山西會館等於四川大城市中，以便鄉親聚會敘舊。這種老會館至今猶存；原有四川土著自己又搞一個川主廟來對抗外來移民。移民常因思鄉心切，在清咸同以來，太平天國尚未大鬧江南的時候，常回各原籍掃墓祭祖，探視親族，各省對由四川回籍的親屬，通稱老叔或川老叔，因為他們多是各姓公房，後來竟訛稱為「川老風」，這未免太不尊敬他們留在四川的公房了。以後各姓子孫繁衍在川定居樂在蜀中，加以時局不靖，由川回籍掃墓的情形漸稀。戴家移居四川時，大移民浪潮已漸過去，是經商入蜀與清初移民四川的情形不同。

### 家道中落備嘗寒苦

戴傳賢的祖父生前，好排難解紛，為鄉族息訟

而涉訟，家道中落，生計日艱。戴六歲時，祖父去世喪葬以後，負債纍纍。其父迭遭訟累，繫獄兩年，所以戴自出生以至幼年均在貧困中生活。戴傳賢嘗言其家貧，親嗜人間苦寒滋味。後來他貴為當朝一品，每年除夕祭神，只一燈一燭為家規，以示不忘先世窮困境遇。

戴傳賢幼年讀書由其祖父、父親督教，他的大哥傳薪常年教其學業，畏如其師。光緒二十八年戴到成都徐子休所辦東遊預備學校讀書，有志游學日本，那時赴日留學是一股澎湃的浪潮。翌年又考入成都客籍學堂，戴秉賦聰明，學習日文進步神速，十五歲便任日籍教師、日文翻譯。戴幾經籌措學費，始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秋到日本入東京日本大學法科。這所學校有中國學生多達千人以上。

### 松濱四友談天高手

戴傳賢到東京時，他的年齡比其他同學都年輕，所以都叫他小戴。他與金銳新都長於日文，始得任東京麹田區松濱館，這家旅館原來不大歡迎中國學生。當時謝健（生於貴州貴陽的四川營昌人）一家與楊子鴻（禧）在同區附近租一幢小房同住，與松濱相距不遠。據謝回憶說，他們下課及星期日互訪互吃，戴經常到謝家吃川菜，同學三年，幾於無日不見，自號為「松濱四友」，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無所不談，戴、謝、金都是四川人都是擺龍門陣的高手。

光緒三十四年秋，戴與胡政之、楊子鴻等人發起組織中國同學會，戴素受學校器重，推戴主

辦，謝、胡、楊等人協助。成立當天，到會中國學生二千餘人，公推戴為大會主席，繼又當選會長，成為學生領袖，會後同回松濱館，戴因重於感情，放聲大哭。據謝健回憶說，他們在松濱館，後來日子愈過愈窮，有錢大家挪用，因此就不敢出門。戴在松濱館的宿費伙食，一欠就是幾個月。日本旅館的慣例，伙食以外的添菜、香烟、洋火、郵票等等都可由旅館墊款代買，月終算清，館主因為敬佩戴傳賢，除了旅館費同墊款不認真討取外，還借給零用錢，後來甚至借錢與他還外間的賬，久而久之，積成巨款，到了他們要畢業的那年（民國前三年），主人也有點力量不夠了，就限期還錢，催逼甚緊。金銳新家裏匯來學費，向來供給戴傳賢用的，但是仍然不夠，因此逼得他不能在日久留，終於提前回國。臨行的時候，他們商量替他餞行，大家都一錢莫名，就是謝還有一個金戒指，送進當舖，得日金五元，上廣東料理店痛飲，大家都醉，戴醉後大哭，由大家扶他回館。第二天上車，到了車站，才發見他的旅費還缺日金三元多，若買了車票，就不夠到橫濱買上海船票了。大家無法，謝急趕回家，把他的日本大學兩年多的講義廿多本，一起再送進當舖，書是不值錢的，一共只當了四元，送到車站，才洒淚而別。所以戴、楊雖與謝同系，畢業却不同時。戴是無錢繳學費，未畢業即先歸國，楊按規定期間畢業，謝早他三個月提前考試，一下十六門全部及格，比兩人運氣都稍好。回國初期，金回川，謝同楊回湖北創辦法院，後先任職武漢檢察廳。松濱四友，就此風流雲散。

戴於宣統三年初回國，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以後轉入言論界漸露鋒芒。戴傳賢自追隨孫總理以後，迭在國民黨中負重要職責，在政貴為考試院長、為黨國要人，昔日松濱舊友不便再以小戴或老戴幼時嬉戲之名相稱，亦不復稱之為「傳賢兄」或「傳賢學長」，便按古例改稱季公以示尊重古代體制。

## 追隨中山先生左右

清宣統三年，戴傳賢亡命南洋檳榔嶼，在當地編輯「光華報」鼓吹革命。由雷鐵崖、陳新政介紹，黃金慶主盟，正式加入同盟會。同年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十月初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山先生自美經法國馬賽乘英輪返國，十一月初六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抵上海，受到黃興、陳其美等人的熱烈歡迎，戴傳賢第一次隨同黨內同志前往拜見。

中山先生於民國元年元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同年四月一日正式辭卸，九月十一日轉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戴傳賢受命為全權機要秘書，從此未嘗輕離，直至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北京為止，歷時十四年。戴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解除政治職責宣言」自云：「民國肇興，更以主義之因緣，受知於總理中山先生，朝夕得聞訓誨，智識思想，由是漸進，而主張行動，遂一以先生之意為從違。」戴傳賢追隨中山先生完全是「主義之因緣」不在獵官受爵，在行動上完全「以先生之意為從違」，

是一個真正革命黨員的光明磊落的態度。

中山先生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名義，於民國二年三月十日下午二時偕馬君武、戴傳賢、宋耀如等五人赴日作友好訪問。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二十二日身死。中山先生聞訊至為悲憤；三月二十三日即偕戴傳賢等自日本長崎匆忙折返，二十七日回到上海，當晚即在黃興寓所商談宋案。黃興意欲法律解決，戴傳賢主武力解決。中山先生同意戴傳賢的主張，後告黃興曰「時天仇在側，力持不可法律解決」。天仇是戴傳賢的筆名，可知戴受中山先生的重視了。

民國二年五月二十日國民黨在上海創辦「國民月刊」，戴傳賢與王寵惠、邵元冲等任主筆。同年八月二日中山先生離開上海經福州、基隆轉往日本，戴與陳其美等隨行。同年九月十五日袁世凱竟下令通緝中山先生和黃興等人，十一月四日又下令解散國民黨，中山先生自是避居日本，戴傳賢隨侍在側。民國三年五月十日，中山先生在東京下令開辦「民國雜誌」，派戴傳賢與楊鹿垵、居正等人為編輯，胡漢民任總編輯，戴從此與黨報黨刊結下深緣。

## 孫中山倚他作股肱

中山先生於民國三年九月二十日在日本召開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討論會，會議共召開十七次，胡漢民、謝持、楊鹿垵、廖仲愷、戴傳賢等人參加，中山先生任會議主席，戴為書記。十月十四日中山先生任戴傳賢為中華革命黨浙江支部長，支部長會議章程囑戴傳賢草擬。戴不久奉

令回國。民國四年四月六日中山先生電戴傳賢、王統一到東京。民國五年戴傳賢、廖仲愷隨中山先生於四月二十七日由日本乘「近江丸」抵上海，戴任中山先生專任秘書。民國六年六月十六日，中山先生派戴傳賢赴日調查中國復辟運動。緣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於同年四、五月間往徐州晤張勳，在上海曾拜晤中山先生。田中回日後盛傳中國復辟黨在日大肆活動，中山先生并有函致田中等人囑戴轉達。戴於六月二十一日到東京，數日後即返上海復命。

中山先生於民國六年九月十日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民國七年二月八日「特任戴傳賢為大元帥府代理秘書長」，四月二日「特任林森署理軍政府外交總長，戴傳賢代理外交次長」。五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辭大元帥職，即日離開廣州，六月十二日偕胡漢民戴傳賢經台灣換乘「信濃丸」到達日本門司，入夜轉赴箱根，六月二十三日自神戶返國，二十五日抵上海從事革命理論著述。戴隨侍上海住上海新漁陽里六號前樓。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發生思想變革的學潮，中山先生鑒於新潮流的來臨，乃令黨內同志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派戴傳賢、沈玄廬（沈定一）、孫隸三為主編，用白話文刊行，以鼓吹新思想。同年六月八日創刊，作為上海「民國日報」附刊發刊（民國九年六月六日停刊，計一共出了五十三期）。同年中山先生又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戴傳賢、廖仲愷、朱執信五人組織「建設社」，同年八月一日在上海創刊「建設」雜誌

，鼓吹建設思想，闡明建設原理，廣傳建設主義。這兩個新刊物的出現，立刻在中國思想界起了很大的作用，吸引了廣大的知識分子。中山先生對社會問題向極注意，適戴傳賢在「星期評論」上發表一篇「國際同盟與勞動問題」論文，主張「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中山先生讀到此文後，便於六月二十二日約戴傳賢在其寓所詳談，非常贊同戴的主張。

中山先生此時在上海居留約有兩年半的時間，致力於理論研究，創辦理論刊物，開啓民智。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滬赴粵，二十八日經香港抵廣州，次日即重組軍政府，在粵期間，雖致力於軍事北伐，始終未遂初志。中山先生不得已於民國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再回上海，即去電吳興召戴傳賢來滬相助，囑任入莫利愛路（Rue Moilete）二十九號公館，「他臥室的對面，書室的隔壁。」中山先生早已視戴傳賢為其親子弟。十月二十二日派戴回川，三十日啓程。

中山先生為貫徹革命初志，決心改組國民黨，民國十二年元月委任居正、楊庶堪、于右任、戴傳賢、廖仲愷、陳獨秀等十八人為國民黨本部參議。十月十九日又派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傳賢、李大釗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戴電辭不就。十月二十八日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推胡漢民、戴傳賢等五人組織臨時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派廖仲愷到上海召集組織。國民黨一大大會於民國十三年元月二十日在廣州舉行，事先戴已表示不願出席大會，廖到滬勸駕無功，戴認為中共加入國民黨，必須造

成單純黨籍，不能有兩黨黨籍，否則易滋混亂。

國民黨一大大會期間，中山先生於元月二十一日指定戴傳賢等九人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元月二十二日戴與廖仲愷等十九人為黨章審查委員，元月三十日戴與胡漢民、廖仲愷等二十四人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元月三十一日，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由中山先生主持，推舉中委廖仲愷、戴傳賢、譚平山為常務委員，戴兼中央宣傳部長，後又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委員。由此可知戴受中山先生的隆遇了。

民國十三年是中山先生一生革命事業中最重要的一年，也是戴侍從中山先生最受重視的一年。四月十一日設立大元帥大本營法制委員會，派戴為委員長，四月二十八日任戴為大本營參議，五月十三日特派胡漢民、戴傳賢等兼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政治教官，六月十三日任戴為軍校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排斥戴離粵，轉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七月十日國民黨中央連電戴回粵，任中山先生指定的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委員。

中山先生為謀求國是，十一月十四日清晨二時乘永豐艦抵香港北上。此行隨行人員十九人：中文秘書：汪精衛、邵元冲、黃昌穀；英文秘書：陳友仁，法文秘書韋玉，德文秘書朱和中，日文秘書戴傳賢（在上海加入），中山先生偕參謀長李烈鈞等人十七日抵上海。十一月十九日中山先生決定繞道日本前往天津轉北京，囑隨行人員分別乘輪前往，以天津為齊集地點。中山先生只指定戴傳賢、黃昌穀、李烈鈞等數人隨同赴日。十

二月四日抵天津，身體漸感不適，來訪人員衆多，指定孫科、汪精衛、戴傳賢分別代見，如有重要事項，仍願親自接談。

中山先生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到北京，除親屬外，吳稚暉、汪精衛、戴傳賢、陳友仁等十餘人在旁侍疾。三月十一日中山先生親簽政治遺囑及家屬遺囑，繼經宋子文、孫科、孔祥熙、邵元冲、戴恩賽、吳稚暉、何香凝、戴傳賢、鄒魯等九人依次簽名證明。次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一代巨人中山先生逝世於北京，享年六十歲。戴從此失去了他個人精神上的唯一導師。

戴對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有其極為重要的貢獻。他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其「解除政治職責電文」中說：「賢（按即戴傳賢）夔蒙總理優容，授以重責，同志不棄，加以大任，自知力與心違，而屢辭皆不獲許，竊賢賦性愚懦，總理在時，事事唯命，尚不克稱職，今無所承，益虞隕越。」民國十五年戴講述「八覺」時，曾一再提到他過去對革命的努力情形：「回憶在過去十七年當中，我自己在中國歷史上，的確負了很重要的使命，許多事業的造因，完全由我而起。但是所有我過去的事業，盡是只有播種，而無收獲；只有造因，而無結果。本來凡是有播種的，一定有收獲的，可是在我的事業當中，慎始全終的事，一件沒有做過。」又說：「當先生（按指中山先生）在時，很能知道我的短處，所以一定不要我負責實際的責任。因為他知道這個是我所不能做的。」中山先生在時倘戴為股肱，一再指任他擔任黨中的重要職務，他始終自謙，一一辭謝。對此

他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解除政治職責宣言」說得很清楚：「總理既逝，余感於十四年來，受知之深，與受惠之厚，……」「余自檳城加盟至去年改組，十數年間，除佐中山先生為祕書外，未嘗敢任中央幹部之職務，此能力所限，性情所拘，無可勉強。去年屢承總理以重任相加，自知絕不相宜，而屢辭俱不得許。總理既沒，宜及時引退矣，又牽於眾議，不能一意孤行。證以數月來竭盡愚誠一無所達，則余之絕不能勝黨國重任，已顯明無餘矣。」由此可知他受中山先生知遇之隆了。

### 蔣介石視他為諍友

戴傳賢早年與蔣介石先生情如兄弟，友情彌篤，介石先生常視戴為「畏友良師」。兩人同為革命相互規勸，互相砥礪，為現代史上難得之諍友。中山先生在上海居留兩年有餘，於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上海航抵廣州，次日即重組軍政府，極需可靠之軍事將才相佐革命，戴傳賢曾銜命急邀蔣介石先生來粵襄贊軍務。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一書記載，中山先生行前於十一月十五日電奉化催蔣介石「去粵」，而介石先生「且家事未了，而去又無益，仍却之。」次日中山先生再電催促「刻有要事面商，請即返滬。」胡漢民、張靜江、戴傳賢同時奉令併電促駕。戴於十二月自上海親到奉化，「二十五日，戴傳賢來奉，強赴粵」與陳炯明共事，介石先生為此與戴有爭執。「二十七日，伴傳賢去滬，越宿即歸。」事後介石先生給戴「兩致書自表歉意。

。」「民國十年元月五日函戴云「日前一劇開場之初，實以兄聲色俱厲，不容我置喙餘地，太子人難堪。兄固愛我者，凡有勸解，無不順從；然弟素性急躁，平時對人，又欠恭敬，而對兄則十分忍耐，故於吃虧受氣之餘，不知不覺之間，蘊釀之久，是以爆發於今茲患難相共甘苦同嘗之日，事後思之，自愧更又自笑。為人不自愛惜，暴棄傲慢，一至於此，有何面目以對良師益友耶！……尚祈曲宥，不吝教益，幸甚。」此信發出兩天後，中山先生再電介石先生「援桂尅日出師，請兄速來贊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延誤為幸。」介石先生復電「隨從督戰，勿居名義。并盼戴傳賢能同行。」

戴接介石先生元月五日函後，元月十四日復函告以下列各點：「即勸兄赴粵，雖屬為公，亦有一半係為兄個人打算，無故而逢兄之盛怒，意與索然，自怨多事，回湖舟中，尤覺有餘痛在。」

「兄之活動範圍，乃在直接擔當方面之任務，閉門家居，僅可云自了而已。前日兄云：『促我出山作事，是促我之壽命。』此語弟聞之頗痛，蓋弟亦大以此為慮者。俗語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兄之自我之強，有不可當者，然而杯酒失意，輒任性使氣，不稍自忍，以此處世，深虞召禍，即不然，亦足礙事業之成功。」

「弟年來力勸兄之赴粵者屢，自信為愛兄故，前日聞兄之言，思之至再，遂不敢復有所勸，亦自信為愛兄故。」

戴為公私計，一再敦促蔣介石先生出山，因兩人情誼至篤，語氣間不免率直，此或為戴個性

使然耳。元月二十日蔣介石復戴元月十四日書，兩人情誼之深，均見於復函中：

「兄之待友，眼格太嚴，鋒芒太露，度量不甚寬大，此其所以少遜於孫先生與靜江（按即張靜江）也。然兄之待吾，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於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為畏友良師。」

「吾之取重於兄者，增我知識，長我學問，助我事業諸益，尚在其次，而在不客氣，不敷衍，規勸督責，不稍假借，時時能導我以正，強我從善，此弟之所以不能須臾離兄者，而兄之所以不輕棄夫弟者，諒亦不以弟侮慢為罪，而終望弟有成業之一日乎？」

蔣介石當時所以不積極於赴粵者，一在不願與陳炯明共事，一在他有「加以對我個人言之，則揮之使去，招之使來，此何等事，而謂吾能忍受之耶？」（元月二十日復戴函中語）之感。（未完）

###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按址按期寄書。